

## 第四章 中共政黨屬性轉變的理論與實質

### 第一節 黨的存在價值與轉變方向

「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把江澤民即位掌權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至「十六大」的十三年，形容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波瀾壯闊」。中共解讀，這十三年曾經面臨了三個歷史關頭的嚴峻考驗：（一）1989至91年，內有天安門社會風暴，外有蘇聯解體與東歐巨變。（二）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後，中國大陸內部因為改革深化而出現思想觀念轉變上的障礙。（三）「十五大」前的1997年2月，鄧小平去世。<sup>1</sup>這三個「歷史關頭」，中共可謂驚險度過。特別是1990年的蘇東波變局，戈巴契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蘇共中央決定解散，葉爾欽總統亦宣布停止蘇共一切活動，隨著這世界上第一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東歐共黨政權也接續垮台。可以這麼說，當時國際共產社會正面臨空前的挫敗與低迷氣氛，依照中共的認知，西方國家於是將鋒芒焦點指向尚在執政且具有指標性意義的中國共產黨。<sup>2</sup>質言之，後社會主義、後共產主義時代的突然降臨，不啻在中共的理論論述與執政性格上，帶來極其強烈的震撼效果，而它在國際社會中打著社會主義國家旗幟的碩果僅存位置，當然也就格外突出。更重要的是，它的綜合國力正快速增長提升。

根據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研究，八十年代末期，中共在政治領域上動作頻頻，其經濟發展預想也頗具野心，尤其開放政策使得沿海城市快速擴張；在此氛圍下，隨之而起的是政治自由化與真正民主化的呼聲壓力。作為一個具備控制大眾傳媒與獨斷決策能力的政黨，中共依舊無法迴避外在共產體系崩解與內在民主要求的雙重挑戰，這種多元主義思潮的蔓延，考驗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sup>3</sup>在此之前或同時，鄧小平多次針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與存在價值提出

<sup>1</sup> 建設等編，*黨的十六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頁16。

<sup>2</sup> 李樹直、郭濱著，*十六大與未來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頁96。

<sup>3</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pp.180-181.

辯護，主要論點集中認為，領導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都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進行，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者，更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sup>4</sup>其次，則以歷史唯物論和中共建政為基礎，視中共領導為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它既經過了中國人民的選擇，也絕對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sup>5</sup>

這種置中共於無可取代核心地位的論述，雖然充斥在諸多鄧所參加的會議與講稿中，但是在「十三屆四中會」後甫接大位的江澤民，仍舊不敢懈怠，汲汲於補充解釋中共執政的必然性與合法性，當然，更重要的附加效果，是確認江作為最高領導的核心首腦。因此，如同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主導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毛澤東功過給予「七三開」的對待，並落實把「毛澤東思想」與馬列主義並舉為意識形態核心的作法，江澤民先在「十四大」中宣揚了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歷史意義，繼之進行了一連串的尊鄧、擁鄧運動，包括在1993年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最後在「十五大」上確立「鄧小平理論」的意識形態核心地位，變相地為江作為繼毛、鄧之後的第三代領導人位置，完成精密設計的推動工作（詳細敘述請見本章第三節）。學者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即認為，江澤民的舉措，符合中共慣用將不同世代的領導者聯繫在一起，以滿足對權威領袖需求的思維；又可以靈活運用制度以鞏固江領導地位，減少權力鬥爭所造成的政治損耗。<sup>6</sup>

在鞏固權力地位的同時，江澤民對於中共獨佔政治優勢的闡釋工作也一併展開，例如：

- 「中國人民選擇共產黨的領導，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在長期堅苦卓絕的鬥爭中得到的共同認識，反映了歷史發展的必然。」（1989年）<sup>7</sup>
-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關鍵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在中國這樣

<sup>4</sup> 鄭必堅等編，*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頁110。

<sup>5</sup> 李鐵映，*論民主*（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8月），頁211-214。

<sup>6</sup>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the 'core':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 of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Jiang Zemin," *China Information*, Vol.xv, No.1, 2001, pp.1-25.

<sup>7</sup> 江澤民，「為把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鬥爭」，*論黨的建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頁6。

的大國，要把十一億人民的思想 and 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由一個具有高度覺悟、嚴明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來領導，是根本不可能的。」(1991年)<sup>8</sup>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全面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不僅能夠領導革命取得勝利，而且能夠領導改革和建設取得勝利。任何懷疑、削弱、否定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作用的觀點與做法，都是根本錯誤和有害的。」(1992年)<sup>9</sup>

●「在中國，要團結凝聚十一億多人民，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集中力量把經濟搞上去，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關鍵在黨；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創建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鍵在黨；要堅持『兩手抓』，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關鍵在黨；要保持社會政治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關鍵也在黨」(1993年)<sup>10</sup>

●「必須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事業勝利前進的根本保證。要把十幾億人的思想和力量統一和凝聚起來，共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設想的。」(1998年)<sup>11</sup>

可以看出，江澤民的表述沿襲了鄧小平理論，同樣以民粹角度強調中共執政的必然，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無限上綱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緊緊相扣，如同回到毛時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絕對論述。例如在1993年紀念中共建黨七十二週年大會的那一段話中，江以四次「關鍵在黨」的說法，把改革開放以來的總體施政藍圖由中共「一肩挑」，筆者以為其中就包含了三個深層意涵：第一、作為唯一且不可替代的執政黨，統攝意識形態及政策制訂的全面主導地位，國家與社會建設的權力，當然只得著落在中共身上。第二、對中共而言，「舉什麼旗」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奉行馬、列主義為規臬，包括民主集中制、

<sup>8</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頁1651。

<sup>9</sup>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頁38。

<sup>10</sup> 江澤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二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同前註，頁327。

<sup>11</sup> 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692。

先鋒隊的菁英主義領導等特質都必須牢牢把握；江澤民與胡錦濤曾多次表示「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就是要在核心理念上保持其理論旗幟的正統、純潔性，同時巧妙擺脫修正主義標籤，如此黨的角色無疑更加吃重。第三、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前提下，「兩個文明」（2001年後又加上「政治文明」，待後述）必須由兩手抓，力求營造一個適合發展的穩定環境，就如江澤民在「十四大」政治報告起草階段即表示者：一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變，二是保持社會政治穩定，就能不斷前進，這其中還牽涉鄧小平理論與「社會主義初階論」，強調基本路線須維持一百年不動搖。<sup>12</sup>

如此，江澤民為中共的持續存在價值找到了理論邏輯：就是在歷史唯物論、社會主義初階論、民粹主義與政權穩定論的交織下，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背景，以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質結果為檢證樣品，最終歸結到「十六大」上將二十一世紀前二十年作為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戰略機遇期，並將高度仰賴「三個代表」的理論高潮。當然，江澤民無法迴避的客觀環境是：中國正處於一個快速變化的時局，必須要「與時俱進」，把改革視為強化共產黨領導的有效工具，就如江在「十四大」政治報告中所言：「改革也是一場革命，也是解放生產力，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滯是沒有出路的。」<sup>13</sup>而在「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即俗稱「論十二大關係」）一文中，江亦表示「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sup>14</sup>這種改革觀點，仍要透過意識形態詮釋權和改革啟動權的交互運用，時間點的拿捏也甚為關鍵，德立克（Arif Dirlik）即認為，中共黨人在處理「社會主義應該扮演創造新社會（New Society）的何種角色」議題上沒有歧異，因為他們關注黨如何運用社會主義作為革命、改革或現代化的意識形態指導工具，最終是要掌握國家權力。<sup>15</sup>江澤民在「十五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即曾表示：「黨的性質、黨在國家和社會生

<sup>12</sup> 李穎編，*從一大到 六大（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月），頁786。

<sup>13</sup> 同註9，頁11。

<sup>14</sup> 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問題」，*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頁1461。

<sup>15</sup> Arif Dirlik, "Revolutionary Hegemony and The Language of Revolution: Chinese Socialism Between Present and Future,"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New York: M.E.Sharpe, Inc. 1989), p.27.

活中所處的地位、黨肩負的歷史使命，要求我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治黨始終堅強有力，治國必會正確有效。」<sup>16</sup>這種對於黨的治理採取高標準對待，刻意強調從嚴治黨的重要性，關鍵用意還是要從反面突顯中共治國的合法與正當價值，也就是不可取代的一黨專政性。

為了在黨的領導、建設與治理之中取得平衡點，有利於鞏固執政地位，中共曾在九十年代以來其中的兩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上，專以黨的建設和作風為主題，提出了較為具體的方略。

1994年9月，中共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一案，會議公報指出，「面對新情況，我們的工作還不適應。一些地方和單位黨不管黨、治黨不嚴，紀律鬆弛、組織渙散，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著種種不容忽視的問題。特別是某些消極因素和腐敗現象在黨內滋長蔓延，嚴重侵蝕著黨員和幹部隊伍。」因此，該次會議決定要把思想建設放在首要地位；繼續抓好黨的作風建設，把反腐敗鬥爭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特別強調組織建設部分，提出了三個推展面向：一、進一步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二、進一步鞏固加強基層組織；三、進一步培養鍛鍊中高層領導幹部。<sup>17</sup>回顧當時，有論者將1994年說成「改革年」、「攻堅年」、「關鍵年」，主要是因為除了經濟成長率繼續維持雙位數（12.65%）表現外，早在1993年11月，中共在「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朱鎔基的主導下，展開了所謂「宏觀調控」策略，要加強中央在經濟方面的集權效能。<sup>18</sup>「宏觀調控」的雷厲風行，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改革開放以來「官倒」與浮誇風氣，尤其是銀行浮濫放款所造成的大規模壞帳、通貨膨脹以及尋租貪腐盛行現象。這也可以說明「十四屆四中全會」設定強化黨的建設主題，突顯中共在思想、組織、黨風紀律腐糜下滑的憂慮。

2001年9月，中共召開「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的決定」，其中重點在於提出「八堅持八反對」，即：「堅持解放思想、

<sup>16</sup> 江澤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頁1105。

<sup>17</sup> 「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同註14，頁957-958。

<sup>18</sup> 凌志軍，**變化：1990年-2002年中國實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頁212-213。

實事求是，反對因循守舊、不思進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反對照抄照搬、本本主義；堅持密切聯繫群眾，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反對獨斷專行、軟弱渙散；堅持黨的紀律，反對自由主義；堅持清正廉潔，反對以權謀私；堅持艱苦奮鬥，反對享樂主義；堅持任人唯賢，反對用人上的不正之風。」要解決的，是使黨群關係與幹群關係獲致明顯改善成效。<sup>19</sup>這個時候的客觀背景是，江澤民甫於建黨八十週年大會上發表著名的「七一講話」，宣示要將「三個代表」作為改進黨執政地位的重要思想依據，但受限於黨內左派人士攻擊，以及社會輿論對於中共有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可能的疑慮。所謂改善黨群關係、幹群關係，焦點都集中在群眾工作的無法落實上，因此，在具有政治繼承重要歷史意義的「十六大」的前一年，中共選擇以「端正黨風」作為中全會的會議主軸，明顯地是對前述各種社會反對聲音的回應，當然，最主要還是為「三個代表」護航，以及為隨後「十六大」的人事甄拔，先行提出預示標準。

除此之外，最具象徵意義的全國代表大會，也分別提出攸關黨的建設與類似改革芻議的方向，至於「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比較分析，將在第五章呈現。表 4-1 臚列出三次大會政治報告中有關黨建改革的標題敘述，從表中歸納可得：

一、意識形態核心是首要論述，思想建設則至關重要。承前述，「舉什麼旗」，一直以來就是中共確立執政路線的首要課題，與此相應的思想建設工作，則是中共賴以掌控黨內意識，使黨員順應統治菁英理論路線的重要憑藉。以意識形態為例，「十四大」突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要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項；「十五大」強調鄧小平理論，把它作為權力競逐和政策藍圖的背景；「十六大」啟動「三個代表」學習高潮，則是江澤民建立個人歷史地位的檢測點。而在思想建設部分，中共則以為，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其負面效應使得幹部思想道德「滑坡」的問題日形嚴重，促使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因此，必須進一步針對黨員思想教育和黨性教育，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sup>20</sup>

<sup>19</sup> 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見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089/5093/6545/index.html>。

<sup>20</sup> 葉海平、王榮發著，*黨的建設戰略和方法*（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頁370。

表 4-1 「十四大」至「十六大」有關黨建改革的標題敘述

屆 別	內 容
十四大	<p>一、認真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增強貫徹執行黨的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p> <p>二、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培養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p> <p>三、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繫，堅決克服消極腐敗現象。</p> <p>四、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p> <p>五、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p>
十五大	<p>一、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根本的是堅定不移地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優勢。</p> <p>二、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根本的是把黨建設成堅強的領導核心，充分發揮黨的組織優勢。</p> <p>三、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根本的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充分發揮黨密切聯繫群眾的優勢。</p> <p>四、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p> <p>五、從嚴治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保證。</p>
十六大	<p>一、深入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p> <p>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p> <p>三、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黨的活力和團結統一。</p> <p>四、建設高素質的領導幹部隊伍，形成朝氣蓬勃、奮發有為的領導階層。</p> <p>五、切實做好基層黨建工作，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p> <p>六、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深入展開反腐敗鬥爭。</p>

資料來源：

1.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頁9。
2.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頁8。
3.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二、組織建設與群眾工作，是共同議題之一。民粹思維與階級屬性，是中共建立並控制政權的理論要件，中共認為，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鬥力的基礎，必須透過基層組織擴大黨的工作覆蓋面。此外，必須將群眾工作重點放在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人和幹部之中，從其間壯大黨的隊伍和基層骨幹力量。<sup>21</sup>尤其是「三個代表」出台後，如何將以私營企業主為首的新階級納入黨的組織體系，更是江主政後期在理論與操作上的全新嘗試。

三、反腐敗成為共同語言，本文第三章已進行分析，此不贅述。

四、緊抱民主集中制教條。江澤民認為：「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黨內生活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是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不可少的制度保證。這一制度的基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於充分調動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在黨中央領導下，集中全黨的正確意見，團結一致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sup>22</sup>另有大陸學者的說法更傳神：「事實證明，黨什麼時候堅持了這一原則，決策就正確，領導就堅強有力，黨就團結統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就充滿活力」<sup>23</sup>，好似民主集中制成為中共決策領導的萬靈仙丹一般。但不可否認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但是相反的，既有體制仍在控制中且不斷成長，如何理解這樣的事實，必須從威權政治的制度性與結構面因素出發。<sup>24</sup>民主集中制，誠然已非布爾什維克時代相同的面貌，但它的確在中共政治結構面上佔有一席之地，且在中共運用得法的情形下，用以籠絡控制黨政扈從者，還是相當有效的。至少中共認為，民主集中制更利於團結人民，較西方民主為優，是黨和國家根本的制度，也是最便利合理的制度，「永遠不能丟」。<sup>25</sup>

五、強調領導班子與幹部隊伍的培養。江澤民曾指出：「一個政黨，一個國家，能不能不斷培養出優秀的領導人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黨、這個國家

<sup>21</sup> 劉小敏主編，「三個代表」與政治文明（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85-286。

<sup>22</sup> 江澤民，「為把黨建設成為更加堅強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鬥爭」，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頁812-813。

<sup>23</sup> 宋士昌、王曉明，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執政黨建設論（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頁76。

<sup>24</sup> 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1, 2003, pp.6-18.

<sup>25</sup> 魯靜等編，江澤民同志重要論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頁258。



的興衰存亡。」<sup>26</sup>江又說：「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不僅要有正確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而且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關鍵是要選好人、用好人。這一條做好了，我們就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sup>27</sup>由於「十四大」時江澤民甫上任，有胡耀邦、趙紫陽的前車之鑑，江自然在領導班子與幹部培養這個議題上，儘量貼近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即已提出的「幹部四化」標準，表達順應之意。到了「十六大」，則在所謂「新老交替」的氛圍中，江以「繼續在位」與「過來人」的雙重身份，重提有關領導幹部隊伍的論述，強調後繼人選的養成。當然，中共歷來最為外界詬病的權力繼承問題，在江澤民時代並沒有獲致完滿的解決，距離領導人產生方式的典章制度化，還遙遙無期。

除上述歸納幾次代表性會議所提出的黨建工作改革方向外，江澤民主政時期還提出了相當重要的口號路線，突顯出江政權的思想轉變，特別要表現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外，還有一套中共黨人所必須遵循的「江澤民學說」。<sup>28</sup>這主要包括（「三個代表」另於第五章專節討論）：

### 一、 依法治國：

1996年2月8日，中共舉辦「中央領導同志法制講座」，江澤民在聽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家富「關於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講座後發表講話，針對依法治國的內涵、基本要求與現實意義進行補充。在隨後的「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江正式宣示了依法治國的思想，指出：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

<sup>26</sup> 此為江澤民於2000年6月「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註23書，頁86。

<sup>27</sup> 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見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8月），頁662。

<sup>28</sup> 此為筆者的理解與用詞，實則目前中共尚未正式採用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並稱的「江澤民學說」此一專有名詞。

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sup>29</sup>

即使是胡錦濤，也在 2002 年 12 月 4 日於「紀念憲法施行二十週年大會」上指出：

「全面貫徹實施憲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都要模範地遵守憲法，嚴格按照憲法辦事。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黨要堅持依法執政，各級黨委和領導幹部必須增強法制觀念，善於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不斷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都要模範地遵守憲法，嚴格按照憲法辦事。」<sup>30</sup>

當然，中共所提出的依法治國，與西方國家所謂的法治觀念（Rule of Law）可能還有一段差距。因為西方的法治，是隱含於文化、倫理、民俗、道德與生活之中，以政治社會化的模式，讓法律內化於國家的統治和社會的領域之內。相較於此，中共的依法治國，強調黨的「治理」和「管理」，姑且不論其力行程度與效果，從字義上看來，也僅止於法制（Rule by Law）層面，當西方國家認為中共應該符合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之際，中共選擇了「法」的概念作為回應途徑之一。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說法，或許是一種合乎中共思維的詮釋，潘維指出，政治改革的導向有兩種選擇：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世界上從未有哪個國家能夠二者同時兼得，因為操作方向不同，無法相容。由於民主化並不能解決吏治、行政（執法）和司法三大問題，反而有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相反，以法治為導向、以吏治為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適合中國的具體特點。<sup>31</sup>

## 二、以德治國；

1996 年 10 月 10 日，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精神文明建設作了詳細規定。1997

<sup>29</sup>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同註 11，頁 30-31

<sup>30</sup> 胡錦濤在紀念憲法施行二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見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21204/881379.html>。

<sup>31</sup> 潘維，「法治與未來中國政體」，*戰略與管理*（1999 年第 5 期），轉引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gb.asp>。

年 9 月，江澤民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強調了道德建設的意義。他指出：「提倡共產主義思想道德，同時把先進性要求和廣泛性要求結合起來，鼓勵一切有利於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思想道德。」<sup>32</sup>至 2001 年 1 月，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江澤民正式提出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sup>33</sup>隨後在三月份召開的「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中共將「以德治國」寫入了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五計畫綱要」文件中。<sup>34</sup>中共學者認為，實施「以德治國」，是要建設新的思想信仰和道德體系，和社會主義法制（即依法治國）共同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有機組成部分。之所以要如此，導因於中國大陸社會傳統信仰體系崩潰，新的體系尚未形成，這種真空現象引發了道德的潰散，進而繁衍出在求富心態下的「一切向錢看」和「求穩怕亂」的消極意識。<sup>35</sup>筆者以為，江澤民所指的「德」，主要是針對官員腐敗、社會道德意識低落的現象，避免使得中共遭受民間責難，危害執政基礎。九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興起一股國學熱，特別是部分中共學者積極探索儒、法治道，甚至將儒學予以「韋伯化」，希望藉此將儒家思想與中共政權的 Charisma 及科層官僚導引出較為深刻的聯繫。觀照在中國傳統「德治」思想上，當代儒學大師韋政通先生即認為，孔孟的中心主張在德治，但有時因闡揚過火，將此理想推而至極，就有類乎政治神話的出現。<sup>36</sup>徐復觀先生則認為，若論及中國的治道，是要人君「捨己以從眾，違欲以尊道。杜讒沮之路，廣諫議之門。」也就是從道德上轉化自己，將自己的才智與好惡捨掉，以服從人民的才智好惡。同時要阻絕妄言，廣納建言，擇善而為。<sup>37</sup>當然，「德」為手段，「治」是目的；江澤民的「以德治國」，自然脫離不出這種管制思維。啟人疑竇者，中國講「德」幾千年，惟中共為何此際強調重提？以無產階級先鋒隊者自居的共產黨人，理應有政治道德上的潔癖，例如毛澤東曾在 1949 年建政前提出「兩個務必」，胡錦濤在就任總書記後考察西柏坡時再次重述，<sup>38</sup>這針對黨人道德與治國道德的要求，對照江時代的「以德治國」，尤其顯示

<sup>32</sup> 同註 29，頁 36。

<sup>33</sup> 見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archive/208133.htm>。

<sup>34</sup> 房寧，當代中國的新政治哲學：論以德治國方略（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 年 1 月），頁 285。

<sup>35</sup> 同前註，頁 3、284。

<sup>36</sup> 韋政通，儒家與現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 78 年 6 月），頁 97。

<sup>37</sup> 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台北：學生書局，民國 77 年 9 月增訂再版），頁 245。

<sup>38</sup> 1949 年 3 月，毛澤東在中共于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

出中共面臨的治理氛圍，很大程度為黨內風氣的惡化所敗壞。

### 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2001年1月10日，江在出席「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時指出：「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後在「五三一」講話中，江又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另江在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講話中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進程，是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設的進程。」在「十六大」報告中則正式把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確立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發展的三大基本目標。<sup>39</sup>

鄧小平在1983年首次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前者致力於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後者則要使人民具有共產主義理想，道德、文化、紀律與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都屬此範疇。<sup>40</sup>文革之後中國往何處去，當時內部有三種論爭：一是「走老路」，肯定文革，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二是「走邪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仿效西方資本主義；三是「開闢一種新路」，大陸學者認為，這種源自於鄧小平理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最佳，即漸進改革道路。<sup>41</sup>這條道路，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立市場經濟，因此，物質文明就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長於意識形態和思想控管的中共，絕未忽略精神文明建設，依其邏輯，要推行「社會主義民主」，就必須同步解決民主與法制問題，而人民文化教育水準的提高是箇中關鍵，<sup>42</sup>那麼落實精神文明建設即不容推緩，因為，這事關中共社會控制與理論宣傳成效。

---

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胡錦濤則在2003年1月2日考察西柏坡時重提。見中國網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archive/275818.htm>、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6/20030102/900369.html>。

<sup>39</sup> 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inese/archive/242308.htm>。

<sup>40</sup> 鄧小平，「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頁28。

<sup>41</sup> 中國漸進改革前沿熱點問題報告，下冊（北京：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編輯出版研究所，2002年6月），頁186。

<sup>42</sup> 同註5，頁313。

至於提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目的，要屬中共「十六屆二中全會公報」所載內容可為最佳說明。該公報指出，「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按照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黨和國家的事業一定能夠更好地向前發展。」<sup>43</sup>由此可知，物質文明談經濟，精神文明講道德思想，政治文明則是聚焦在以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治為外衣，核心訴求還是「堅持黨的領導」，因為唯有「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sup>44</sup>

#### 四、三講：

承第一章所述，中共在 1996 年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正式做出推動為期三年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運動，而運動的高潮，則是在 1998 年。當時江澤民曾謂：「中央決定，今明兩年要集中一段時間，在縣級以上領導幹部中深入進行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要求縣以上黨政領導班子以整風的精神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有針對性地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sup>45</sup>隨後，中共就開始逐步、逐層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討論會，確實採行了延安整風的精神，以團結—批評—團結的模式，<sup>46</sup>將主軸圍繞在基本黨建理論和擁護黨決策的政治正確宣導上。根據江的說法，「三講」目的對外而言，是因為世界發展很快，中共必須密切注視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方面的變化，只有學習、觀察才能制訂正確的政策方針。<sup>47</sup>對內，則應該以講政治為核心，著重在五個方面：一、堅定對馬克思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增強鑑別判斷重大政治原則是非的能力。二、增強落實黨政策方針的自覺性、堅定性。三、為人民服務、嚴守紀律、抵禦各種腐朽思想。四、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五、樹立儉樸形象、反對浪費作風。<sup>48</sup>有觀察者認為，「三講」推行效果並

<sup>43</sup> 人民網，<http://www.peopledaily.com.cn/GB/shizheng/16/20030226/931707.html>。

<sup>44</sup> 江澤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39.htm)。

<sup>45</sup> 江澤民，「在學習鄧小平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註 7，頁 296。

<sup>46</sup> 同註 25，頁 245。

<sup>47</sup> 江澤民，「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同註 27，頁 701。

<sup>48</sup> 江澤民，「在廣東省高州市領導幹部『三講』教育會議上的講話」，同註 27，頁 715。

不突出，原因出在中共領導層力量薄弱，意志不堅，處理縮手縮腳，學習流於形式。比如講學習，反面教材眾多，幹部互相啟發的結果是哀榮與共、學習官場心得。講政治多是強調政治領導，歸納成一種貪污、走私、受賄的政治。講正氣則在「大會小會不斷」的情形下，各級領導臨陣無勇，不敢帶頭自我剖析、犧牲利益。如此，「三講」學習便形同癱瘓。<sup>49</sup>然而，筆者以為，「三講」的實施成效並非一片空白，但也不在其真正的表面論述意義；因為講政治是最重要的核心任務，既然在政治掛帥的情形下，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否講的真話，只得憑天論斷。江澤民的用意，恐怕還是想要仿效延安整風模式，藉由幹部之間的鳴放批評，提供中共中央組織部門，尤其是曾慶紅在人事考評和甄拔的依據，以為後來舉行的「十六大」人事安排鋪路。而隨著「十六大」籌備工作逐漸就緒，「三講」的階段性功能完成，自然以淡化收場，此際就無須再賦予其更多的道德性要求。

上述諸般作為，可以突顯出一個事實：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階層分化，尤其是利益分殊化，使得中共的階級領導基礎面臨重大挑戰；同時，目前的中國大陸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而江澤民要應付者，是腐敗風氣、政治改革、政權復甦等重大議題。<sup>50</sup>面對這些挑戰，使江澤民採取立基於黨性質的政治體制改變的初衷，關鍵是要打造一個持久的政治系統，且在打造過程中，不會導致黨、國家、和社會的不穩定狀態。<sup>51</sup>從現實狀況看，江的意圖差堪達成，因為自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相對關係，並沒有出現如文革、一九八六、一九八九年時的緊張動盪，即使為人詬病處仍多如牛毛，但是在中共維持集體領導下的高度個人統治化與非制度化，以權威、寡頭的治理概念處理「變」的問題，<sup>52</sup>使得這個動態過程尚在中共的掌控範圍中。大陸一位文字工作者凌志軍，給了江澤民與中共這樣的評價：「十三年前，江澤民意想不到地成為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真可以說是受命於危難之中。他決心盡一切可能防止中國出現混亂局面。如果有人預言十三年後的中國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相信，那時候我們聽到的預言，都是說共產黨幾年之後就會垮台。」凌又言，「毫無疑問，共產黨在

<sup>49</sup> 黃維暉，「談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內容」，星島日報美國版，見 [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3r/r2000ex01.htm](http://www.future-china.org/spcl_rpt/3r/r2000ex01.htm)。

<sup>50</sup> You Ji, "Jiang Zeming's Command of the Military,"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131-138.

<sup>51</sup>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Challen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21~35.

<sup>52</sup> Parris H. Chang, "Changing of the Guard," *The China Journal*, No.45, 2001, pp.37~43.

過去幾十年來改變了中國，但它如果不想讓自己變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須在改變中國的同時也改變自己。」<sup>53</sup>真可謂一語道破！

## 第二節 黨的改革轉變與基本屬性之聯繫

欲分析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共在黨這部分的改革，就必須觀照到更高層次：政治體制改革；而論及政治體制改革，就不能省略出台的背景：「十三大」，因為「十三大」政治報告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方略，勾劃了大致輪廓。該報告將政治體制改革臚列出六大重點：一、強調黨政分開、調整黨組織形式和工作機構的具體措施。二、明確權力下放原則，重新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三、從反官僚主義出發，強調政府職能轉變。四、幹部人事制度改革，鼓勵競爭和民主監督。五、正確處理協調社會利益矛盾，建立協商對話機制。六、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尤其是人大與政協。<sup>54</sup>

由上觀之，當時有關黨的改革部分，最主要集中在黨政分開這個議題上，這是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著力最深的工作之一，與其相關者，包括了政企分開、廠長負責制、黨委權力調整等。<sup>55</sup>就政黨與權力運作的模式而言，這個改革是一種「內外有別」的列寧式制度主義或「道德精英主義」的政黨模式，<sup>56</sup>既強調黨的組織與紀律，也重視黨內政治生活的合理化與常規化，並賦予黨新的功能與任務。若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來看，則依舊可以回歸到統合主義概念：即國家與社會並非一種宰制的關係，在國家所設定的框架下，社會擁有所謂相對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是以不挑戰中共統治的正當性為前提，社會是鑲嵌在黨和國家的權威之內。然而鄧小平所設定的改革框架和黨內外政治生活的邊界，是建立在一種理想型與「假設其他條件不變」的基礎上，當改革的各項政策深入到各領域時，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環境與社會條件也產生極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正是

<sup>53</sup> 同註 18，頁 486-488。

<sup>54</sup> 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5月），頁 385。

<sup>55</sup> 相關研究請參閱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 3 月），頁 115-137。李英明，**鄧小平與後文革的中國大陸**（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 年 8 月），頁 20-21。朱新民，**一九七八—一九九〇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台北：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80 年 12 月），頁 85-100。

<sup>56</sup> 李英明，「鄧小平、劉少奇與毛澤東：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的本質」，**東亞季刊**（台北：1995 年），頁 3。

江澤民時期所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

另一方面，尋求形勢發展和階級基礎的有機結合，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共的主要戰略選項之一。特別是九〇年代之後，中共看到世界上幾個長期執政的政黨紛紛交出政權，中共持續追蹤考察所獲得的基本結論是：這些政黨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發生了脫鉤現象，突出表現在失去青年，尤其是從事新經濟的青年企業家、青年知識份子的支持。<sup>57</sup>進一步解讀，中共認為黨執政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有了落差，包括社會階級、階層、群體構成部分，呈現出多元化、複雜化的特點；而城鄉關係、工農關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關係的轉變，加深了各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現象。大陸學者王茂林認為，中國大陸社會正處在利益矛盾增多、體制摩擦加劇、腐敗現象易發的階段，促使中共黨的作風問題比以前更加突出，若解決不好，則會危及黨的事業。<sup>58</sup>裴敏欣亦指出，市場取向的經濟政策，使中共看起來像是一個為自己服務的資本主義統治菁英的集合體，而非為勞動者爭取福利的無產階級政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提出，都是在最低成本下取得中共穩固執政的最高利益。然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野心，遺留下來一堆難解的問題，尤其是社會自主意識和獨立性團體增長，無可避免地將會成為共產主義轉型中的政、經、社領域的矛盾緊張。<sup>59</sup>

在這種思維前提與現實情形交織下，中共勢必認識到：如何兼顧理論與實際，讓黨的改革與基本屬性的有機聯繫，符合客觀環境變化的要求，當然，更要符合權力穩定。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的分析，以江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的具體作法：

一是「黨的集中整頓」，包括 1989 年 9 月進行的黨員重登記；以及 1998 年的「三講」。

二是「建章立制」，包括：

<sup>57</sup> 李君如，「正確理解和堅持黨的階級性」，林融主編，*新世紀的思考*（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164。

<sup>58</sup> 王茂林，從執政黨地位看黨的作風建設，*求是*（2001 年 10 月），見

<http://www.qsjournal.com.cn/qs/20011016/GB/qs^321^0^A2.htm>。

<sup>59</sup> Minxin Pei, "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 October 2002, pp.97-98.



1989年，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

1990年3月，「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繫的決定」。

1994年9月，「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按：依前述，會議主題放在思想、組織和黨風建設）。

1995年2月，印發「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

1997年2月，發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

1998年11月，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共同印發「關於實行黨內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

1999年2月，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

2000年6月，做出「關於面向二十一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

2001年9月，「十五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按：重點在於解決黨群關係）。<sup>60</sup>

依此分析，這些「通知」、「規定」、「條例」、「決定」涵蓋面甚廣，包括了組織、思想、黨風、黨群關係、黨紀、幹部任用與培養等面向。按照李君如的說法，江澤民等人作出這些黨的建設的諸般決定，是為了服膺鄧小平在交班時的政治交代，即「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而江於2000年1月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報「三講」實施狀況時強調，其十年來謹記鄧的政治交代，就是關注在兩大問題上：一是不斷加強黨的建設、鞏固執政地位；二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增強綜合國力和兩個文明建設。<sup>61</sup>而另一中共學者認為，江澤民黨建工作的施為，可以用「十五大」報告中的「八十字建黨綱領」來詮釋，那就是「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此時黨的建設總目標的探索臻於完善，更加明確、全面。<sup>62</sup>

承上述，「十五大」之後的中共，應該在黨的改革、建設與鞏固執政地位方

<sup>60</sup> 李君如，「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基礎」，求是（2003年7月），頁28。

<sup>61</sup> 同前註。

<sup>62</sup> 陳光林主編，鄧小平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頁12。

面，取得了理論上的有機辯證結合。但與此同時，「十五大」又提出了「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兩大新課題」，即「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以及「不斷增強拒腐防變能力」，「十五大」之後，中共復在新課題論述上，補進了「增強抵禦風險能力」的要求。關於領導執政水平，和本文第二章提出中共基本屬性的執政主體論，具有直接的聯繫；至於拒腐防變，是兩個用詞不同、但具有相互關係的概念。「十五大」之前，中共通過「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強調「執政黨的黨風關係黨的生死存亡。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是新時期從嚴治黨、端正黨風的重要前提，是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維護政治、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sup>63</sup>可以看出，再怎麼拒腐，終究還是要「維護政治、社會穩定」，要防止因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帶來的和平演「變」，防止「國變色、黨變修」，因為這一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屬性就要受到挑戰質疑。而抵禦風險，雖然是隨著外在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而提出，但中共真正用意，還是要建立內部的執政風險概念，因為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已非昔日的立足穩固了。綜合看來，拒腐、防變、抵禦風險，前提都必須建立在中共本身領導執政的水平上，其中的邏輯關係，清晰可見。

然而，筆者依舊認同前述凌志軍所言，中共在改變客觀環境的同時，不能忽視主觀認知的轉換。早於 1989 年底，江澤民在一個黨建理論研究班上的講話曾強調：「不管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將怎樣變化，對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進一步把自己的黨建設好，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好。」江還稱：「一些人藉口我國階級狀況、階級關係有了新的變化，世界上發生了新技術革命，企圖否定工人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和國家的領導階級，從而否定黨的階級基礎，否定黨的性質，最終否定黨的領導地位。對這股逆流，我們必須堅決頂住。」<sup>64</sup>不過，就在江發表這段關乎政黨屬性與執政地位談話後的十餘年間，中共或許沒有設想到，中國大陸的社經情勢發展，出現了如同馬克思所謂「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變化。康曉光認為，自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共從「革命黨」轉變「執政黨」，變成了奉行「實用主義」的「理性經濟人」，其目標是執

<sup>63</sup> 中共中央紀委紀檢監察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 年 2 月），頁 421。

<sup>64</sup> 江澤民，「為把黨建射程更加堅強的工人階級先鋒隊而鬥爭」，同註 7，頁 2、5。

政或掌權，只要能維持或擴大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任何理論、道路、原則、價值都可以接受。而黨政官員價值觀庸俗化的結果，使得中共已經徹底拋棄了舊意識形態。<sup>65</sup>

康曉光這種接近道德主義的觀點，點出了中共無法抗拒地出現了質變的現象。這個現象導因於在經濟發展、意識形態詮釋、黨國官僚政治壟斷的相互糾葛之中，中共又回到了類似鄧小平時代「摸著石頭過河」的理論探索狀態。<sup>66</sup>雖然江澤民、胡錦濤一再強調「老祖宗的東西不能丟」，但受制於官方意識形態不受支持、高層無力遏止腐敗、立基於經改的合法性天生脆弱的現實，<sup>67</sup>促使中共思考的課題是：要變的是統治方法，同時顧及政權基礎。<sup>68</sup>質言之，縱使如江言「面對新形勢新任務，如何進一步改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實現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的創新，是當前我們黨的建設、也是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以及「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sup>69</sup>的感慨，筆者以為，在這「新」「老」之間的取捨選擇，中共還不至於如康曉光所言完全徹底拋棄舊有意識形態，或許「無產階級政黨」已少提，因為如今要中共黨人都「無產」，可能沒有人會接受，特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彈性說法，讓私有財產觀念的落實出現較大進展；<sup>70</sup>至於「三個代表」的提出，則更使人對於中共所謂「無產階級」代言人的信服程度大為降低；但是在「工人階級先鋒隊」方面的論述則依舊堅持。

中共對於此點的思考，始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後，「工人階級是否仍是先進階級？」、「中國共產黨是否仍要以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

<sup>65</sup> 康曉光，「中國：改革時代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站，<http://www.usc.cuhk.edu.hk/wkgb.asp>。

<sup>66</sup> Carol Lee Hamrin, "Inching Toward Open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45,2001,pp.123~129.

<sup>67</sup> Frederick C.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45,2001,pp.75-82.

<sup>68</sup> Dingxin Zhao, "China's Prolonged Stability and Political Future: same political system, different policie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28,2001,pp.437~440.

<sup>69</sup> 江澤民，「努力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同註 64，頁 485-486。

<sup>70</sup> 這種觀點在中共內部已成主流，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出版的一份著作中即表明，「在我國，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著國家政權，也共同佔有著國家和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因此，我國工人階級已經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工人階級，不僅在政治上擺脫了『無權』狀態，在經濟上即在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上，從整體上看，也擺脫了『無產』狀態。」見李慎明主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若干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1月），頁114。

江澤民的論述不再多談，倒是李君如的解讀可讓吾人略知端倪。李指出，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中國工人階級，仍是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隨著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推進，這一階級的人數還會增多，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統計，至2000年止中國大陸約有2.7億職工，而由農轉工的比例繼續上升。「三個代表」提出後，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業和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的職工也列入工人階級領域，顯示中共對於「工人階級」的概念釐定正在外延化，且和西方所謂「白領」、「藍領」的對立式區劃概念有很大出入，因此李認為，中共堅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是有新的含意，而非簡單地重複過去的舊結論。<sup>71</sup>

即便如此，這個宣稱「儘管今天世界上許多共產黨改黨名、從黨章上刪去『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提法，我們黨仍然宣布自己是『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政黨，<sup>72</sup>是否真的照顧到工人階級的利益，堪稱工人階級的代言人，仍然有待商榷。依中共的解釋，無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是中共組成的理論要素與結構重心，「八二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載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sup>73</sup>惟經由歷史現實的檢證，中國是否真為工人階級所領導，已不言可喻，當然，中共以菁英主義的理由，強調先鋒隊的地位無可取代，<sup>74</sup>但就如鄧小平在1950年代所言：

「毛主席指示我們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如何依靠呢？第一，必須從思想上認識工人階級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無法搞好工業生產，就不可能發展到社會主義。第二，必須把工人的最大多數組織到工會中去，並依靠工會去教育工人，啟發其階級覺悟，發揮其生產積極性。第三、用高度的熱忱去關懷工人階級的各方面，從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質福利上去關心他們，不要忽略有利於工人的『小事』。第四，依靠工人階

<sup>71</sup> 李君如，**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新認識**（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頁202-204。

<sup>72</sup> 同前註，頁202。

<sup>73</sup> 翁松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269。

<sup>74</sup> 例如，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即提到，「黨以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階級基礎，並不是把工人階級放在一個客體的位置上，而是以工人階級做為主體，黨做為工人階級實現自己歷史使命的工具。黨和階級的關係，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黨是由工人階級中的先進份子所組成的先鋒隊組織，顯而易見，工人階級是通過自己的政黨為自己整個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的。」見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編，**學習江澤民同志黨的建設思想 五講**（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7月），頁64。

級必須成為黨的指導思想，必須貫徹到各部門中去，不能把它看做只是工會和工廠的事情。」<sup>75</sup>

與其說是「依靠」，嚴厲地說，還不如是「利用」，就像鄧在同一段講話中所舉：「有的工人說：『國民黨時候我們是牛和馬，現在是馬和牛』。」<sup>76</sup>因為中共倘能依鄧所言，連有利於工人的小事都能關心，就不至於出現許多生產關係緊張的現象。以當前最令中共頭痛的社會難題之一：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安置為例，根據中共國務院於 2002 年 4 月公布的「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中所載，1998 年至 2001 年，中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 2550 多萬人<sup>77</sup>，參照前述「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職工總人數統計，可以得知有高達百分之十的工人下崗，即使中共聲稱有完善的再就業培訓計畫，但仍無法掩蓋不滿的呼聲。較為著名的案例，包括 1997 年「十五大」召開前三個月所爆發的四川省綿陽市十萬失業工人「反貪官、求生存」示威活動，以及 2002 年 3 月五萬多名大慶油田下崗工人抗議官方的削減待遇福利，同一時間，則還有近萬名遼陽市的工人強烈要求政府發放拖欠的工資，並要求罷免遼陽市人大主任龔尚武。<sup>78</sup>

一篇探討中國大陸貧富差距擴大的文章指出，市場的轉型，使得部分國有企業職工被整體地拋到了失業群體當中，而中國過去的社會保障大都是與單位所有制聯繫在一起，如果下崗和失業，就表示職工失去了工作和工資收入，同時也失去了許多福利和社會保障。<sup>79</sup>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全中國大陸恐怕還有眾多失業無助的勞工，等待中共政府給予輔導救濟。「三個代表」強調中共與先進生產力的緊密結合，但是卻無法立即化解生產關係的矛盾，即便中共以適者生存、汰劣存優的說法，來解釋為因應市場經濟與經濟結構戰略調整而出現的裁員下崗情況，就利益法則而言是可以接受的；而其如何有效分離出生產者和冗員（例如後勤、政治宣傳、或離退休者），讓生產者多得、非生產者無法剝奪生產者利益

<sup>75</sup> 鄧小平，「在西南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題綱」，鄧小平文，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75-176。

<sup>76</sup> 同前註，頁 176。

<sup>77</sup> 見中國網，<http://www.china.org.cn/ch-book/429/index.htm>。

<sup>78</sup> 劉正慶，「大陸下崗職工年年增加暴露中共官民矛盾」，見大紀元網，<http://www.epochtimes.com/b5/2/5/22/n191515.htm>。

<sup>79</sup> 涂名，「差距擴大不可逆轉，社會保障本來不難」，中國改革（2003 年第 8 期），頁 22。

的具體作為，也符合了公平原則與經濟效益。<sup>80</sup>只不過，擅長理論詮釋的中共，以自己代表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和革命的堅定性徹底性性格」，<sup>81</sup>似乎已經先驗地宣判了工人似乎必須承擔政策決定，作為某種變革下犧牲品的宿命。可以這麼說，江時期中共黨性質的轉變，除了繼續為執政利益與權力穩固服務外，與其他基本屬性的聯繫程度，已經在逐漸流失降低中。

### 第三節 黨建工作的主軸：思想、組織人事、黨風黨紀

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sup>82</sup>依照「中國共產黨大辭典」的解釋，毛形象地把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比作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而把黨的建設當作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因此，黨的建設是三大法寶的中心環節，其他二者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發揮作用。<sup>83</sup>這三大法寶，是中共在「革命」中戰勝敵人的武器，但在其強調「執政」的當口，依舊重要，特別是做為中心環節的「黨的建設」。以前述「十四屆四中全會」為例，該次會議主題即為黨的建設，當時中共內部對於危機的認知和對付危機的能力出現了巨大的鴻溝，以江澤民為首的高層強烈意識到，自己正處於權力交接和制度轉型的雙重危機中，也面臨著自身力量被嚴重削弱而外界環境日益複雜的困境，因此，必須立即提出一個總體、根本的對策。<sup>84</sup>經過了九個年頭之後，江澤民在他最後一次主持的「十六大」開幕式政治報告上，為中共黨的建設目標，提出了「四個一定要」的階段性總結；<sup>85</sup>延續「十五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十六大」強調黨的建設必須貫注在思想、組織與黨風三大領域。本節即將針對這三個面向，探討江時期的具體作為與影響。

<sup>80</sup> 徐滇慶、李瑞，**中國大陸政府政策與經濟發展**（台北：大屯出版社，民國88年8月），頁186-187。

<sup>81</sup>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同註7，頁512。

<sup>82</sup> 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569。

<sup>83</sup> 同註54，（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134。

<sup>84</sup> 吳國光，**逐鹿 五大**（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6月），頁68。

<sup>85</sup> 見第三章，註96。

### 一、思想領域：

長期以來，中共就把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建設首要任務來抓，強調黨員不但要在組織上入黨，更要在思想上入黨；而其能夠掌握中國政權逾半世紀，眾所周知，也是有效實施意識形態灌輸，自詡保持思想上的純潔性、一致性，並輔以政治控制的結果。然而，改革開放，尤其是九〇年代之後，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共體認到內部思想逐漸出現自由放任的現象，依其評估，在意識形態領域甚至到了多種思想觀念相互碰撞、矛盾錯綜複雜的地步。<sup>86</sup>

為此，如何把這個首要任務所面對的險峻情勢予以扭轉，是江澤民的重要戰略部署思維。1989年12月，江在初掌政權後出席由中宣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組部、中央黨校合辦之「黨建理論研究班」會議時，即開始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擺在黨的建設首位；<sup>87</sup>1991年4月江出席「全國黨建理論討論會」，在談話中他引了幾段「老祖宗」的話，舉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言：「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復引恩格斯「卡爾·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文，謂恩格斯講道：「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再提列寧「沒有理論，黨就會失去生存的權利，而且不可避免地遲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壞」；以及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所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最後採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等文，指出：「我們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科學思想的結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瞭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88

在引述理論與歷史之際，其實江澤民掌權後的首要工作還是「尊鄧」、「擁鄧」，因為這關乎理論建構、權位鞏固及領導效能。「十四大」後中共中央決定出

<sup>86</sup> 劉小敏主編，「三個代表」與政治文明（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80。

<sup>87</sup> 同註7，頁9-12。

<sup>88</sup> 江澤民，「加強黨的理論建設」，同註7，頁22。

版「鄧小平文選」，並下發「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學習綱要」至各層級，在黨內外開展鄧小平理論學習計畫，<sup>89</sup>1993年11月即很快地正式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依照中共的說法，是要以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發行的同時，中共中央又做出「關於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決定」，並召集省部級幹部參加「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報告會」，江在會上以極端推崇的口吻，強調鄧小平理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同地位，卻具備更為重要、甚至無可比擬的思想內涵，關鍵在於鄧理論的核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up>90</sup>「十四大」以及「鄧選」第三卷出版後，鄧理論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幾乎成為每個中共黨人朗朗上口的詞彙，而「中國特色」也頓時成為中共面對改革採取正面積極或負面敷衍的最有力辯護工具，有關西方制度「拿來主義」的仿效，說成是因為中國特色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於否定不利中共執政的外部思維，也歸納是中國特色的「不照搬、照抄西方制度」規臬而加以排斥。當然，鄧所主導的社會主義初階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議題，也依舊保持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共意識形態中的重要論述地位。可以這麼說，在「鄧選」第三卷問世至鄧小平逝世前後，江澤民幾乎「言必稱鄧小平理論」，而鄧理論也因此順勢成為中共意識形態「核心中的核心」。<sup>91</sup>

除了建構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地位外，江澤民等領導集體還推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建設工程，依照「人民網」在其「十六大」專題網頁中羅列出十六個「關鍵詞」，其中「鄧小平理論」、「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依法治國，以德治國」、「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三講」、「兩大歷史性課題」、「八個堅持、八個反對」、「兩個先鋒隊」等九項，前文已有論述，此

<sup>89</sup> 同註 74，頁 173。

<sup>90</sup> 江澤民，「用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同註 7，頁 108-119。

<sup>91</sup> 例如，1997年2月，鄧小平逝世，江在追悼大會上稱：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同年5月29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強調，深入紮實、持久地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是黨的建設的首要任務。「十五大」中，中共正式採用了「鄧小平理論」稱謂。同年底，江在「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學習鄧小平理論和十五大精神研討班」結業式上，要求全黨把學習鄧小平理論提高到「十五大」所達到的水準。1998年2月，在「紀念鄧小平時逝世一週年會議」上，江發表「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的講話。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在全黨深入學習鄧小平理論的通知」。7月17日，江又在「學習鄧小平理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宣布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12月18日，中共召開「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週年理論研討會」，江則要求全黨必須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不動搖。同註 25，頁 2。



不贅言；至於「幹部選拔任用工作要堅持走創新的路子」，將在本節後段討論；而「三個代表」、「與時俱進」、「學教」活動等，則在第五章分析。此外，本文另依據大陸學者著作，擇取出「兩個堅持和完善」、「一個實現」，連同扣除前述十三項議題後的「四個如何認識」、「一個中心，三個著眼於」、「五種精神」等，抽繹其要點製成表 4-2。

從這五項中共慣用的以數字為歸納的思想口號觀察，在理論基礎建構上，中共還在宣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的競逐，藉由回溯馬克思主義，為其改革開放所接襲的現代化建設，找到一個既趨近歷史論述，也符合現實條件的出口，其中很重要的掙扎點，就在國際因素的制約以及中共本身詮釋與迎拒外來思潮的能力，質言之，就是對於「和平演變」的態度與中國如何「走自己的路」。其次，所謂「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創新」精神，有很強大的為理論修正進行辯護的效果；而「艱苦奮鬥」與「無私奉獻」，摒除道德主義觀點來看，則是對黨紀不振與黨風滑落的美化修辭。

當然，必須回到原點的是，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忘，包括實際政治制度與思想方略，都還是要強調中共處在無可替代，否則中國將會面臨混亂的絕對至高地位。這種思維，很大程度突顯出一種新保守主義的特質，即：一、強調漸進主義的改革策略。二、高度的國家主義成分。三、以中國傳統與西方思想的對照，點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邏輯脈絡。四、試圖找到一條不同於傳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即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國家主義與集體主義、有限市場等面向的道路。五、突出民族主義，特別是愛國主義的解釋作用，以「富國強兵」、「落後就要挨打」的訴求，修飾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及政策方針的不可違逆性。

92

---

<sup>92</sup> 祖治國，90年代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台北：致良出版社，民國87年11月），頁37-42。

表 4-2 江澤民主政時期有關思想建設議題整理

議題名稱	內容簡述
四個如何認識	1.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歷程。 2.如何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 3.如何認識我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過程對人們思想的影響。 4.如何認識當今的國際環境和國際鬥爭帶來的影響。
一個中心，三個著眼於	1.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際問題、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 2.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五種精神	1.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 2.緊跟時代、勇於創新的精神。 3.知難而進、一往無前的精神。 4.艱苦奮鬥、務求實效的精神。 5.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精神。
兩個堅持和完善	1.堅持和完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2.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以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一個實現	實現社會安定、政府高效廉潔、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和睦、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資料來源：

- 1.人民網，<http://past.people.com.cn/GB/shizheng/252/8712/8715/index.html>。
- 2.陳述，*理論方略*（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頁150-153。

另外，中共還以實際的政治、社會現象，強化思想工作地位，特別是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情懷。例如舉 1998 年抗洪搶險、美國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兩國論、法輪功、南海 EP3 軍機擦撞事件等例子，聲稱大陸「人民群眾都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熱情和愛國主義精神，形成了強大的聲勢。反之，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軟弱，抓得不緊，錯誤思想氾濫，人們的思想亂了，人心散了，就會產生嚴重

的後果。」<sup>93</sup>

綜合看來，擺在江澤民等人面前的問題是，當中共體認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必須依靠解放生產力、制度改革的途徑，去換取真正的物質文明之際，還要同步地強化精神與政治文明，因為這是維繫統治地位的必備條件。至於解放思想，就如前述是為其核心理論進行辯護，因此在「解放」的同時，更要強調「堅持」的重要，依照大陸學者的說法，就是依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解放思想必須和四個堅持產生有機聯繫效果。於是，從真理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和經濟私有化的論證爭辯，最終還是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入咎，歸結到不可侵犯黨的解釋權所具備的絕對權威。<sup>94</sup>易言之，思想的構築，難以由民間或個人啟動，即使來自於社會氛圍，也要經過黨的認證；當然，黨在思想理論的發難、建設上不會落後，因為中共觀諸歷史認為「理論先行」很重要，列寧為了贏得十月革命花了十年時間準備理論，而毛澤東甚至浸淫了二十年才有中國革命的成功。只不過改革開放之後的實踐過程越來越複雜，使得相應理論往往缺乏前瞻或指導性，甚至落在實際之後，因此，中共認為無論是「行動的巨人、思想的矮子」或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都對中國現代化發展不利。<sup>95</sup>鄧小平曾謂：「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sup>96</sup>鄧的說法，好似肯定了思想建設與理論來源的多元性，但是，真正的重點，應該還要歸結於江澤民的一句話：「只有理論上的堅定，政治上才能堅定」。<sup>97</sup>就以「三講」運動中的「講學習」為例，中共的觀點是：

<sup>93</sup> 同註 74，頁 169。

<sup>94</sup> 大陸學者莊福齡指出，「真理多元化」觀點主張無條件的思想解放，要揚棄馬克思主義哲學，改造真理一元論，認為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照樣可以在解放思想中探索並掌握真理。因此，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多元論」、「經濟私有論」便呼之欲出，這在 1979 年開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中得以體現。這些論者對馬克思主義提出「過時論」、「變形論」、「反決定論」，因而主張「真理多元論」。對社會主義提出「超階段論」、「補課論」、「橫比論」、「異化論」，因而要求「經濟私有化」。對黨的領導提出「排除論」、「專制論」、「公開反對派論」，因而主張「多黨制論」。對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假民主，真專制統治論」、「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論」，因而要求「政治多元化」。對此，莊總結，1989 年的北京政治風波，就是否定解放思想要遵循四項基本原則，從而導致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氾濫的結果，這個教訓是慘重和深刻的。莊福齡，**中國體制改革的哲學探索**（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 2 月），頁 173-174。

<sup>95</sup> 翁明杰等主編，**與總書記談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頁 254。

<sup>96</sup>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133。

<sup>97</sup> 江澤民，「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6 年 1 月 25 日。

「從黨的歷史上看，什麼時候理論和實際結合得好，黨的事業就蓬勃發展；反之，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因此，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我們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會更加自覺和全面，就能排除各種錯誤傾向的干擾，避免和減少在工作中出現片面性、絕對化和左右搖擺。通過學習，堅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sup>98</sup>

黨決定一切，尤其是思想，盡乎於此。

## 二、組織人事領域：

大體而言，江澤民時期在黨組織部分的變動幅度並不大，學界關注的焦點多集中於國務院機構精簡，以及中央領導層級的人事分析。由於國務院機構精簡並非本文論述重點，故不予討論；至於黨組織的變化與人事安排，筆者則有若干分析見解。

組織龐大、控制綿密，是中國共產黨的形式特色之一，而屬於黨的建設一環的組織工作，歷來為中共重視的程度，堪與思想意識形態並列，早在「一大」當時，中共即把中央層級劃分為書記、宣傳、組織三大部分，可證此言不虛。<sup>99</sup>即使到了中共建黨近八十年後的二十世紀末，江澤民還是表示：「要鞏固和發展好的形勢，解決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問題，完成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各項任務，靠得是什麼呢？主要有三條：一是正確的理論和路線的指導；二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團結奮鬥；三是黨的各級組織堅強有力。」<sup>100</sup>

江主政的十三年間，中央組織出現較大變化者，首推「十四大」通過裁撤「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的決議。這個決定，早在1989年天安門動亂稍微平息後，鄧小平即在「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的談話論及其退休時間和方式時提出，鄧言：「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

<sup>98</sup> 同註25，頁240。

<sup>99</sup> 李穎編，**從一大到六大（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月），頁26。

<sup>100</sup> 這是江澤民於1997年發表的「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註11，頁146-147。

退休制度。」<sup>101</sup>「十二大」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離退休老幹部為主體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既搭建一個政策建議舞台讓老人揮灑，也暫時解決若干仍具影響力老幹部的安置問題，當時鄧小平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會主席身份，出掌甫成立的中顧委主任一職，薄一波等四人擔任副主任；「十三大」，鄧小平辭職由陳雲繼之，薄一波續任副主任；「十四大」則正式通過不再設立，該建制壽命恰巧十年。<sup>102</sup>「中顧委」的裁撤，象徵鄧小平、陳雲等第二代領導人正式退出政治舞台，改採隱身幕後的策略，而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則可以在形式上擺脫老人政治的介入，開始扮演起檯面上的決策角色。

至於其他重要中央組織，包括政治局、書記處、中央軍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及工作部門如中宣部、中組部、統戰部、對外聯絡部等，除組成結構與人數有所變革外，仍舊維持既有建制。

在基層組織部分，黨員人數從 1991 年的 5151 萬人（占當時全中國總人口比例 4.5%）到 2002 年底的 6694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比例 5.3%），十年間增長幅度近 30%，這與總人口的增長幅度相比（1991 年是 11.6 億人，2000 年達 12.7 億人，增加幅度為 9%），是有較大的擴張趨勢。而在黨員教育程度的分佈上，如表 4-3 所示，初中以下（含文盲）和高中以上（含研究生）的比例幾乎各佔一半（49.8：50.2）。而黨的基層組織數量，則如表 4-4，自 1987 年至 2000 年十三年間的增加幅度為 22%。

此外，「十四大」的黨章修改動作，針對中共基層黨組織進行了調整，其中包括：

（一）縣一級的黨委會任期由三年改為五年，基層委員會則由三年改為三或四年，總支部委員會、支部委員會由二年改為二或三年。如此，中共以為是要因應基層黨員人數、單位規模、工作性質、職責權限、和分佈狀況等差異較大的現

<sup>101</sup> 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頁 316。

<sup>102</sup> 根據中共的解釋，中顧委設置的構想是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組織設計，經過兩個五年就可以完成歷史合作。「十四大」通過取消該組織，是「根據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建議」，同註 12，頁 823-824。筆者以為，依照中共的說法，係中顧委自行向中共中央建議取消建制，真可謂「顧全大局」，實際上，在本文中已引述鄧小平的說詞，是鄧的一己之見，決定了中顧委的存廢。

表 4-3 中共黨員教育程度統計 (至 2002 年 12 月 31 日止)

學 歷	占有黨員比例
文盲	2.5%
小學	19.9%
初中	27.4%
高中	17.4%
中專	11.7%
大學	20.5%
研究生	0.6%

資料來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成就概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11月)，頁96。

表 4-4 中共基層黨組織 (基層黨委、總支部、支部) 數量統計  
(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止)

基層組織總數： 351.8 萬	鄉鎮：136.1 萬個	鄉鎮企業單位數： 683.5 萬個	具備建立黨基層組織條件者：9.5 萬個
	城市街道：7.9 萬個		
	村：207.8 萬個		已建立黨基層組織者：8.5 萬個
1997 年基層組織數	351.4 萬個		
1992 年基層組織數	329 萬個		
1987 年基層組織數	287.4 萬個		

資料來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成就概覽(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11月)，頁97。

象，改採彈性規定。

(二) 明定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黨支部，領導本地區工作，支持和保證行政組織、經濟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充分行使職權。中共認為，如此既明確地方組織的地位與職責，也明確基層組織並非包攬所有領導領域，有助於黨政分開。

(三) 有關企業黨組部份，只針對全民所有制企業進行規定，在以下五個領域發揮「政治核心作用」：1. 保證監督黨和國家的政策方針，政策在本企業的貫徹執行。2. 支持廠長（經理）依法行使職權；堅持和完善廠長（經理）負責制。3. 依靠職工群眾，支持職工代表大會開展工作。4. 參與企業重大問題決策，包括發展方向與目標、幹部培養和選拔、精神文明建設等。5. 加強黨組建設，領導思想政治工作和工會、共青團等群眾組織。

當時，幾乎事業單位都存在「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和「黨委領導下的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兩種模式，針對前一種情形，「十四大」黨章強調基層黨組「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後一種情形則規定「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保證行政負責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職權。」

(四) 針對基層組織的基本任務，增加了「學習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高黨員素質，增加黨性」、「做好經常性的黨員發展工作，重視吸收在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中的優秀份子入黨」等內容。<sup>103</sup>

在備受各界關注的高層人事變動部分，「十三大」所選出的最高領導結構，包括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五人，趙紫陽擔任總書記、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六四」事件後中共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增補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江為總書記，趙紫陽與胡啟立則被免去職務。緊接著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退出中央軍委會，由江澤民接任主席一職。這是「十四大」開幕前的高層人事狀況。

表 4-5 列出「十四大」至「十六大」的高層人事演變結果，由表可以得出：

<sup>103</sup> 同註 12，頁 824-825。

(一) 政治局常委會：「十四大」及「十六大」更動幅度均較大，這是因為此兩屆都是「世代交替」或「新老交替」的大會，相應地年齡結構亦較「十五大」年輕，至於學歷則全為大學以上。而「十五大」最為特別者，是劉華清退出後，常委會已無軍系人士出任。另「十六大」來自地方「一把手」的比例大為提高，人數之多，也是中共黨史中少見現象。<sup>104</sup>

(二) 政治局：與常委會類似者，「十四大」、「十六大」的更換比例大，平均年齡低，除「十五大」有兩人為非大學學歷外，餘均受過高等教育洗禮，且理工領域為大宗。特別是「十六大」，總人數和地方領導幹部比例均是三屆最高者。此外，三屆都維持兩名軍系成員，似已成為慣例。

(三) 書記處：更動比例、年齡結構和政治局相仿，前後兩屆接近，「十五大」特殊，而學歷亦均是大學以上，理工專業為主。但由於書記處負責日常中央黨務工作，故無地方大員參與。

(四) 中央軍委會：「十六大」的更動幅度最高，平均年齡大為降低，而且除 66 歲的曹剛川資歷較深外，幾無「老將」在內。究其主因，應該是江澤民經過十餘年的經營，已經能夠掌握軍系動態與權力，故在「十六大」續任軍委主席之際，已無需老軍頭壓陣護航。

高層政治人事的更迭固然是觀察重點，但或許是事涉敏感，中共中央對此幾乎少談，反而對外表現出更為關注者，是整個黨的幹部培養問題。事實上，鄧小平早在一九八一年時就已提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份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sup>105</sup>因此，當鄧小平隨即提出「幹部四化」的講法後，江澤民對此要求就不敢輕忽，例如在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江強調「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建設。關鍵是按照幹部隊伍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

<sup>104</sup> 觀諸中共黨史，只有「八屆十一中全會」出現十一位政治局常委，以及「十大」選舉九位常委，其他大會產生政治局常委的數目，均不及「十六大」。

<sup>105</sup>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同註 96，頁 287。



表 4-5 中共「十四大」至「十六大」中央權力結構

		十四大	十五大	十六大
政治局常委	人數	7 人 (3 人新任)	7 人 (2 人新任)	9 人 (8 人新任)
	成員	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
	年齡	平均年齡 63.4 歲	平均年齡 65.4 歲	平均年齡 62.1 歲
	學歷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1 人(14.3%) 理工農 5 人(71.4%) 軍事院校 1 人(14.3%)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1 人(14.3%) 理工農 6 人(85.7%)	均大學以上, 全為理工農領域
	籍貫	東部 3 人(42.9%) 中部 3 人(42.9%) 西部 1 人(14.2%)	東部 4 人(57.1%) 中部 2 人(28.6%) 西部 1 人(14.3%)	東部 5 人(55.5%) 中部 4 人(44.5%)
	屬性	政府 2 人(28.6%) 軍方 1 人(14.2%) 黨務 4 人(57.1%)	政府 4 人(57.1%) 黨務 3 人(42.9%)	政府 7 人(77.7%) 黨務 2 人(22.3%)
政治局委員	人數	20 人 ( 新任者 13 人 ), 另候補 2 人	22 人 ( 新任者 7 人 ), 另候補 2 人	24 人 ( 新任者 15 人 ), 另候補 1 人
	成員	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丁關根、田紀雲、李嵐清、李鐵映、楊白冰、吳邦國、鄒家華、陳希同、姜春雲、錢其琛、尉健行、謝非、譚紹文、( 溫家寶、王漢斌 )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丁關根、田紀雲、李長春、李鐵映、吳邦國、吳官正、遲浩田、張萬年、羅幹、姜春雲、賈慶林、黃菊、溫家寶、錢其琛、謝非 ( 曾慶紅、吳儀 )	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幹、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賀國強、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周永康、俞正聲、郭伯雄、曹剛川、曾培炎、( 王剛 )
	年齡	平均年齡 61.9 歲	平均年齡 63.1 歲	平均年齡 60.6 歲
	學歷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9 人(40%) 理工農 11 人(50%) 軍事院校 2 人(10%)	非大學 2 人(8.3%) 文法商 3 人(12.6%) 理工農 17 人(70.8%) 軍事院校 2 人(8.3%)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4 人(16%) 理工農 17 人(68%) 軍事院校 4 人(16%)
	籍貫	東部 12 人(54.5%) 中部 6 人(27.3%) 西部 4 人(18.2%)	東部 16 人(66.7%) 中部 7 人(29.2%) 西部 1 人(4.1%)	東部 14 人(56%) 中部 10 人(40%) 西部 1 人(4%)

	屬性	地方 5 人(22.7%) 政府 8 人(36.4%) 軍方 2 人(9.1%) 黨務 7 人(31.8%)	地方 5 人(20.9%) 政府 11 人(45.8%) 軍方 2 人(8.3%) 黨務 6 人(25%)	地方 10 人(40%) 政府 8 人(32%) 軍方 2 人(8%) 黨務 5 人(20%)
書記處書記	人數	5 人 (4 人新任)	7 人 (3 人新任)	7 人 (6 人新任)
	成員	胡錦濤、丁關根、尉健行、溫家寶、任建新	胡錦濤、尉健行、丁關根、張萬年、羅幹、溫家寶、曾慶紅	曾慶紅、劉雲山、周永康、賀國強、王剛、徐才厚、何勇
	年齡	平均年 59.3 歲	平均年齡 61.9 歲	平均年齡 59.7 歲
	學歷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1 人(20%) 理工農 4 人(80%)	均大學以上 理工農 6 人(85.7%) 軍事院校 1 人(14.3%)	均大學以上 文法商 2 人(28.6%) 理工農 4 人(57.2%) 軍事院校 1 人(14.3%)
	籍貫	東部 3 人(60%) 中部 2 人(40%)	東部 5 人(71.4%) 中部 2 人(28.6%)	東部 3 人(42.8%) 中部 4 人(57.2%)
	屬性	黨務 5 人(100%)	政府 1 人(14.3%) 軍方 1 人(14.3%) 黨務 5 人(71.4%)	政府 2 人(28.6%) 軍方 1 人(14.3%) 黨務 4 人(57.1%)
中央軍委	人數	7 人 (4 人新任)	7 人 (4 人新任)	8 人 (6 人新任)
	成員	江澤民、劉華清、張震、遲浩田、張萬年、于永波、傅全有	江澤民、張萬年、遲浩田、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江澤民、胡錦濤、郭伯雄、曹剛川、徐才厚、梁光烈、廖錫龍、李繼耐
	年齡	平均年齡 67 歲	平均年齡 67.9 歲	平均年齡 63 歲
	學歷	均大學以上 理工農 1 人(14.3%) 軍事院校 6 人(85.7%)	理工農 1 人(14.3%) 軍事院校 5 人(71.4%) 非大學一人(14.3%)	理工農 2 人(25%) 軍事院校 6 人(75%)
	籍貫	東部 4 人(57.1%) 中部 3 人(42.9%)	東部 6 人(85.7%) 中部 1 人(14.3%)	東部 4 人(50%) 中部 1(12.5%) 西部 3 人(37.5)
	屬性	黨務 1 人(14.3%) 軍方 6 人(85.7%)	黨務 1 人(14.3%) 軍方 6 人(85.7%)	黨務 2 人(25%) 軍方 6 人(75%)

備註：括弧內數字分別為新舊任說明、佔該領域總人數之百分比。

資料來源：1.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年報**，1993 年。

2.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年報**，1998 年。

3.中共研究雜誌社，**中共年報**，2003 年。

專業化的方針和德才兼備的要求，選好人用好人。」<sup>106</sup>1997年「十五大」時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針，建設一支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高素質幹部隊伍。」<sup>107</sup>同年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著重講述了「一把手」的問題，以「堅持原則、把握全局、團結同志、加強修養」為指標訓誡黨員。<sup>108</sup>復於2000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以「對領導幹部一定要嚴格要求、嚴格教育；對領導幹部的選拔任用一定要嚴格把關；對領導幹部一定要嚴格監督；對領導幹部中發生的違紀違法行為一定要嚴肅查處」，<sup>109</sup>具體論及幹部培養、教育與管束的方向。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認為，江時期在組織人事，尤其是幹部制度上的改變，主要表現在：一、菁英政治較為理性、正常化，使外界可預測。二、決策逐漸多樣化、制度化，從依賴個人拍板權威轉為領導小組的集體決策。三、甄補人才的管道也趨多元化。四、更為強調發展經濟的治國能力，以及中心概念必須符合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要求。<sup>110</sup>這個說法，筆者僅能部分認同。縱然較諸毛時代的盲動浪漫，以及鄧時代的「一個人說了算」，江所代表的集體領導確實較符合理性主義模式，但若言「正常」，則是對於中共領導人產生機制模糊、未形諸制度的現象給予高度的美化。其次，決策「多樣化」所指為何？由於一切的決策都是要為中共領導而服務，若是「多樣」，就有「走樣」的危險，故最後還是要回歸民主集中制。甄補人才多元化則有明顯趨勢，這是因為中共開放海外留學後，已逐漸有所謂「海歸派」學人歸國服務並受重用的現象，而徵才的標準，也開始注重知識專業，尤其是經濟領域長才，易言之，技術官僚當權的情況也慢慢普遍起來。當然，沈氏言必須符合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要求，以中共的意識形態標準來看，是無庸置疑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於2002年7月23日「十六大」舉行前夕頒佈了「黨

<sup>106</sup> 江澤民，「切實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同註7，頁122。

<sup>107</sup>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同註11，頁47。

<sup>108</sup> 江澤民，「高中級幹部要意識到肩負的重大歷史責任」，同註7，頁283。

<sup>109</sup> 江澤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必先從嚴」，同註7，頁366-372。

<sup>110</sup> David Shambaugh,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The China Journal*, No.4, January 2001, pp.101~111.

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是該條例自1995年先採試行,經過7年之後甫正式認可施用。根據中共學者研究,此「條例」的正式出台,與中共幹部培訓工作離黨和人民還有一定差距、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還出現不適應現象有關,這主要表現在:一、幹部甄拔重「選」輕「育」,重「用」輕「管」;二、缺乏幹部考察的科學方法;三、評價制度不完善;四、幹部監督,特別是針對「一把手」的監督不嚴謹;五、幹部激勵方式只有提拔任用,助長幹部「官本位」意識。<sup>111</sup>因此,「條例」頒佈似有針對上述陋習之意,包括以下幾項基本原則:黨管幹部、選賢任能、注重群眾公論和實績、公開、平等、競爭、擇優、民主和依法辦事,並提出六大堅持,希望培養出德才兼備、紅專兼具的「新世紀接班人」。<sup>112</sup>

這個條例選在「十六大」前頒佈,除了顯示中共歷來強調的「道德精英主義」訴求,已經難以約束、規範幹部;還有附帶的效果,即江要展現「三個代表」在黨建與幹部政策上的實踐作為。前面多次論及,中共近來在幹部風氣考核上,出現了道德滑坡的憂慮,這種憂慮是有道理的,例如江澤民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上,就曾經針對加強幹部隊伍建設、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四個疑問:一、一些領導幹部為什麼頻頻發生腐敗問題?二、為什麼一些案件已露出蛛絲馬跡,卻無人予以揭露,且幹部還能繼續得到提拔?三、有些人熱衷於封官許願、拉幫結派、以個人好惡和恩怨用人,把幹部任用權當成發財致富手段。四、為何有的幹部在考察時都很好,上任不久就出問題,甚至是大問題?<sup>113</sup>江的提問,很大程度突顯出中共幹部人事制度的缺漏,在於主觀主義與個人心態凌駕了制度查核之上。因此,在「條例」內文中,就針對選任與考察方法列出客觀標準,以工作經歷、學歷、黨齡為主要指標;<sup>114</sup>並以民主集中制的推薦原則,

<sup>111</sup> 李建華等編,《黨政領導幹部制度改革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8月),頁3-4。

<sup>112</sup> 所謂六大堅持為: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堅持德才兼備、又不求全責備;堅持選人標準,又不拘一格;堅持五湖四海,又唯才是舉;堅持用人所常,防止用其所短;堅持既看素質,又看實績。同前註,頁8。

<sup>113</sup> 同前註,頁2。

<sup>114</sup> 例如第七條規定:提拔擔任黨政領導職務的,應當具備下列資格。1、提任縣(處)級領導職務的,應當具有五年以上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2、提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的,一般應當具有在下一級兩個以上職務任職經歷;3、提任縣(處)級以上領導職務,由副職提任正職的,應當在副職崗位工作兩年以上,由下級正職提任上級副職的,應當在下級正職崗位工作年以上;4、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他地(廳)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一般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5、應當通過黨校、行政院校或者組織(人事)部門認可的其他培訓機構累積五年內累積三

和行政責任的追究精神，對幹部的「上」與「下」給予制度的依循。<sup>115</sup>鄧小平於1962年在「全國組織會議」上曾提出「多少年來，我們對幹部就是包下來，能上不能下，現在看來，副作用很大」，「這一點，我們不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能上能下的。」<sup>116</sup>中共掌握中國政權超過半世紀，既無競爭，亦乏輪替，加上機構臃腫、組織龐大，黨政幹部為官多少會浸淫在中國傳統官僚與封建心態的隱性催化中，而在「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的政治學鐵律下，所謂賣官鬻爵、官官相護的情形在所難免，端視情形嚴重程度。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所做2002年中國大陸社會形勢分析調查為例，大陸民眾對於影響當地社會穩定現狀的主要因素選項中，城鄉居民分別將「腐敗官僚主義」列為第一、二位，<sup>117</sup>再從鄧小平、江澤民的言論看來，幹部管理是到了必須正視處理的地步。因此，「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出台，或許就是中共認真對待領導幹部培養、甄拔和考核的一項舉措；而中共傳統所講的「紅」與「專」，以及鄧小平所要求的「幹部四化」，在物質誘惑、道德滑坡和紀律鬆弛的交互影響下，能否發揮實際效果，未來或可由此「條例」的施行過程獲致答案。當然，如果這種能上能下的制度，援引至高層領導結構，使之明文化、規範化，那麼中共最為外界詬病者：政治繼承的不確定，應該就有改革的條件空間，只是胡錦濤是否有這種決心與擔當，筆者並不樂觀。

### 三、黨風領域：

前已提及，腐敗問題一直是江澤民時期的施政沈痾，拒腐防變成為「十五大」之後中共黨建工作的兩新課題之一。江澤民曾經表示：「黨內存在的一些消極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有的情況還日趨嚴重」、「如果治黨不嚴，發展下去不是沒有亡

---

個月以上的培訓，確因特殊情況在提任為達到培訓要求，應當在提任後一年內完成培訓；6、身體健康；7、提任黨的職務的，應符合《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的黨齡要求。

<sup>115</sup> 例如在條例第十條中規定：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幹部，必須經過民主推薦提出考察對象。民主推薦包含會議投票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民主推薦的結果在一年內有效。第十一條規定：領黨班子換屆，民主推薦按照領導班子職位的設置全額定向推薦；個別提拔職務，按照擬任職務推薦。另規定，嚴重失誤失職者引咎辭職，用人失察失誤要追究責任，辭職包括因公辭職、自願辭職和責令辭職；選拔任用工作責任亦有詳細的規定。

<sup>116</sup> 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29、330。

<sup>117</sup> 汝信、陸學藝、李培林主編，社會藍皮書，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月），頁22。

黨亡國的危險啊！」<sup>118</sup>以江用「亡黨亡國」這四個相當嚴重的語氣字眼看，中共黨內的腐敗問題極其嚴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要治理腐敗，黨的風氣與紀律難辭其咎，例如他在「七一講話」中即表明「黨的作風，關係黨的形象，關係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命。」<sup>119</sup>

其實，不只江澤民這麼看，也有中共學者認為，一些幹部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喜歡搞長官意志，強迫命令，成了高高凌駕於人民群眾之上的「老爺」，這些問題，常常引發幹部與群眾的矛盾和衝突，甚至尖銳對立。<sup>120</sup>還有說法是，雖然黨的作風「總的是好的」，但有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即在幹部群中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滋長，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虛報浮誇嚴重，獨斷專行、渙散問題突出，以權謀私、貪圖享樂現象蔓延。而歸根到底，是脫離群眾；如果中共這個執政黨不注重作風建設，聽任不正之風侵蝕黨的肌體，就會損害黨群關係，甚至失去民心、政權。<sup>121</sup>

對此，中共經常以蘇共為例，探討其在黨風問題上的不堅定，導致政權淪失的後果。在一篇名為「黨風問題關係執政黨的生死存亡—蘇共在黨的作風問題上的教訓與啟示」文章中即提到，蘇共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在於：

（一）忽視黨群關係：包括黨的主要領導人嚴重脫離群眾；階級鬥爭擴大化破壞黨群關係；幹部特殊化嚴重損害黨群關係；機構臃腫、官僚主義嚴重、工作作風惡劣、嚴重脫離群眾。

（二）黨內缺乏民主，黨員和群眾意見得不到反應，從而導致矛盾的累積和激化。

（三）未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故無法防止腐敗現象。

（四）缺乏正常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無法保證黨的肌體健康。

據此，中共得到的執政黨建設啟示為：必須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

<sup>118</sup> 江澤民，「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同註 7，頁 363-364。

<sup>119</sup> 同註 81，頁 519。

<sup>120</sup> 陳克敏等主編，*面向新世紀的思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 月），頁 171。

<sup>121</sup> 廖建新主編，*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問題解答*（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221。

係；要堅決懲治腐敗；執政黨必須建立健全的內在和外在監督制約機制；執政黨必須加強黨內民主建設。<sup>122</sup>故在「十五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的決定」，並做出兩個層次的概括，一是前已述之「八堅持八反對」，二則是「五風」，即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幹部生活作風。<sup>123</sup>

令人疑惑者，所謂保持和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關係」，究竟意指為何？以中共的解釋認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最大的危險，就是脫離群眾，因此越是執政時間長，越要注重黨的作風，而檢驗黨作風最好的標準，就是人民擁護、贊成與否，這就要靠兩個方面來保持，一為學習、覺悟，二是制度。<sup>124</sup>所謂學習、覺悟，強調黨政幹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以求提高黨在群眾路線上的自覺性與堅定性。制度方面，要使權力運行走上法制化軌道，建立聯繫群眾制度，讓體察民情的管道暢通，拓寬民主監督機制，特別是發揮群眾監督作用。<sup>125</sup>

相比之下，中共在「學習、覺悟」方面下的功夫較多，因為意識形態宣導歷來就是中共的強項，再加上「三講」的學習過程，以及「三個代表」的前仆後繼構建，讓江澤民在理論方面取得了較有利的主導地位。至於中共幹部是否真的在這當中有所覺悟，恐怕有一段漫長路要走，以「三講」為例，中共在 1998 年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在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領導幹部中深入開展以『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為主要內容的黨性黨風教育的意見」內即強調，有相當一部份領導幹部「急切近利」、「沽名釣譽」、「當官作老爺，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貪圖享受、揮霍浪費」，致使「損害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削弱黨組織的凝聚力 and 戰鬥力。」<sup>126</sup>如果不是病入膏肓，中共應不至於用如此多的負面形容詞以進行自我檢討批判。如果中共幹部學習、覺悟的效果佳，那麼從毛時代以來所建立的各種政權護衛機制，也不會在群眾路線這個「黨的生命線」上，至江澤民時

<sup>122</sup> 劉戰主編，**實踐「三個代表」，鞏固執政地位—蘇共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與啟示**（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9月），頁260-276。

<sup>123</sup> 同註25，頁293。

<sup>124</sup> 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係使用「學習」與「制度」，另有中共學者說法為「覺悟」及「制度」。

<sup>125</sup> 同註25，頁298-300。

<sup>126</sup> 同註63，頁476。

期險些栽跟斗，讓江說出「亡黨亡國」之類的警語。

「制度」方面，通俗地說應該是「照章辦事」，中共則將其擴大、美化為「依法治國」。江表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吃拿卡要、索賄受賄、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等問題時有發生，群眾反應很強烈。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我們政法隊伍的形象，損壞黨和政府的威信。」<sup>127</sup>依照「人民日報」的報導，從中共「十五大」到 2001 年底，關於黨風廉政建設的法規及規範性文件出台有 2300 餘件。在「人」的部分，2000 年 6 月中共中央頒佈「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綱要」，隨後中組部召開「全國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經驗交流會」，兩年後復頒佈「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此外通過「關於黨政領導機關推行競爭上崗的意見」、「關於進一步做好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工作的通知」、「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暫行規定」，希望藉由在幹部制度中採取的末位淘汰制、末位待崗制、領導職務任期制、試用期制、聘任制，或者推動鍛煉性交流、回避性交流、任職期滿交流等，欲使幹部能「下」逐步制度化。<sup>128</sup>

而在民主監督、民情管道通暢部分，在資訊逐漸發達的今天，中共似乎依舊維持傳統的政治動員或社會控制模式，特別是針對一般民眾。康曉光即認為，城鄉大眾一般只能對危害其切身利益的問題做出反應，例如經濟停滯、金融風險、分配不平等、貧困；而反應的手段，則可如表 4-6。康指出，目前中國大陸民眾處境可謂「全面惡化」，這是因為九〇年代以來大陸人均收入不平等現象快速擴大，基尼係數增加為 0.45，已進入世界最不平國家行列。八〇年代的「雙贏」局面，讓菁英與大眾生活有所改善；而九〇年代則是「贏家通吃」，在經濟、社會、政治方面，大眾地位相對下降，特別是工人和農人的絕對地位也在下降，菁英階層全面攫取了經濟發展成果。<sup>129</sup>由於菁英相互聯盟，大眾幾乎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面臨政治腐敗、裙帶資本主義、嚴重不平等與貧困、巨大經濟風險等命題，如果現行制度無法有效解決，則最終將會被自己所製造的問題所吞噬。<sup>130</sup>

<sup>127</sup> 江澤民，「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同註 11，頁 166。

<sup>128</sup> 張強，「黨建巡禮：規範的制度建設，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制度建設成就綜述」，*人民日報*，2002 年 10 月 13 日，第一版。

<sup>129</sup> 康曉光，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2002 年第 3 期），頁 11。

<sup>130</sup> 同前註，頁 15。



表 4-6 群體/手段的矩陣排列

		集體行動手段												
		軍事政變	大眾傳媒	電話傳真網路	社會運動	宗教氣功	NGO	俱樂部小群體	地下組織	集會遊行示威	集體上訪	集體暴動	個人犯罪活動	海外力量滲透
群體	菁	政治菁英	+											
	英	經濟菁英						+						
		知識菁英		+	+	+		+	+					+
	大眾	城鄉大眾					+		+	+	+	+	+	
		脆弱階層					+			+	+	+	+	

資料來源：康曉光，未來 3-5 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戰略與管理**（2002 年第 3 期），頁 8。

從表 4-6 中可得，受限於客觀環境的限制，中國大陸一般民眾較難透過科技媒介進行意見表達，最常見的手段，還是訴諸於民間社會自發性的組織活動，雖然其中涉及中共允許的信訪制度，但部分還是選擇了走體制外的路線，也許這較能獲得輿論媒體或官僚階層的注視，當然風險也隨之提高。因此，當中共汲汲於端正黨風，主觀上試圖重新回到與群眾間保持濃厚血肉關係的執政高峰之際，客

觀的社會緊張氛圍，包括失業現象加速、區域發展失衡、社會分配不公、農村情勢不穩等，<sup>131</sup>將給中共帶來更大的轉變上的抉擇衝擊。因為在社會問題日趨繁重與困難的處境下，中共如果刻意壓抑社會組織，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果是內部的分裂不穩定，以及外部的質疑不信任，連帶影響到經濟發展環境。西方學者即認為，中共強調黨風領域應該聯繫到的群眾工作信條，其實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當中所觸及的，真正地落實黨內民主、黨政分離，尤須允許社會組織表達其利益。<sup>132</sup>

筆者發現，八十年代鄧小平執政時期，中共對於黨風黨紀問題著墨甚少，這應該是經濟發展剛起步，利益分配與道德挑戰還未臻矛盾之故；江澤民執政的九十年代，情況有了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十五大」至二十一世紀初，江對於黨風黨紀所發表的談話頻率遠高於以往，使用詞句也更加嚴厲。<sup>133</sup>即使中共不厭其煩地強調，也在黨紀部門揪出幾件省部級官員違法亂紀的大案以彰顯其決心，但有多少成效，其評判結果來自於人民的回應。「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中共針對黨風所提相當寫實的口號，也是中共自認在組織、動員、宣傳工作上的有力法寶，惟當諸多中國老百姓痛惡官員腐敗，對中共的「反腐倡廉」、「拒腐防變」口號失去耐心與信心，又缺乏適當表達的管道，隱然成為社會可能再次爆發的「顛覆式反對運動」時，中共若再囿於向金權妥協，不自制度上力求變革的結果，<sup>134</sup>所謂「密切聯繫群眾」、「保持血肉關係」不啻為一諷刺，而「黨的形象」、「黨的生命」也就要如中共看待蘇共一般地令人堪憂了。

<sup>131</sup> Joseph Fewsm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66,2001, pp.573~591. Lucian W. Pye, "Jiang Zemin's Style of Rule: Go for Stability, Monopolize Power and Settle for Limited Effectiveness," *The China Journal*, No.45,2001,pp.45~51.

<sup>132</sup> George 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 "China's Coming Transform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80, No.4, 2001,pp.32~33.

<sup>133</sup> 依照筆者統計，江從 1989 年至 1997 年，以及 1998 年至 2002 年針對黨風建設所做的談話，分別是 22、38 次，而 1997 年以前所做談話，有一半以上集中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調查權與發言權」、「幹部學習」等內容；而「十五大」之後的談話，就多以「黨的形象」、「黨的生命」、「黨群關係」、「反腐倡廉」、「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為主。同註 27，頁 622-654。

<sup>134</sup>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 89 年 3 月），頁 241。